

類人孩與專制中國的未來—— 為王力雄獲第二屆當代漢語貢獻獎而作

◎ 余世存

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決定將2002年當代漢語貢獻獎授予王力雄先生，學術委員會委托我作主題報告並對此情況進行說明。

這並非榮幸之事。至少目前為止看來仍是如此。在今天，正直的人們只有沉默才能保有清白的時候，聰明之徒善於無言以示有清潔精神的時候，試圖做一項公共活動實在是難以討巧的。更何況，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是一個並沒有注冊的研究機構，它在中國大陸要獲得身份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它能有多大的作為呢？多年前，在醞釀創辦這樣一個研究所時，我曾經想到過，即使失去存在的中國前提，它也應該頑強地經驗並表達一個自由正義而超拔的研究機構所稟有的全部內容。它設立當代漢語貢獻獎也是為了表彰那些對當代漢語——這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知識——作出重要貢獻的機構和個人，表彰那些不回避中國問題，提出文明新生路徑的思想家們和實踐家們，表彰那些懷著不忍之心給當代漢語的寫作和傳播注入生命，注入理想主義和超越情懷的努力。它打出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的旗號，也是為了交流的方便，但在中國社會裏生存，它難以壯大，它設立的課題無能實現，它創辦的網站只能關閉，它不求救世度人，只願在混沌的世界裏尋求自己的標準，但今天它只能以個人至多同仁的形式存在。

更為困難的，對王力雄先生的很多情況，我跟大多數人一樣並不了解。對當代中國的知識界乃至社會而言，王力雄幾乎是不存在的，用時髦的話說，這幾乎是個虛擬人物。他人已中年，沒有工作，沒有職業，單身，住在北京，經常外出，去西藏新疆多達幾十次，經常一走半年。他基本上不介入漢語學界的交流、研討，也沒有跟著曾經一度眾聲喧嘩的漢語學界一起起哄。這樣的人在我們社會裏還有很多，活著等於不存在，不會與周圍有血肉聯繫。談論王力雄先生和他的成就是困難的。由我來談論大概是因為我跟他一樣沒有社會身份，也由於拙文在《關於九十年代的漢語思想》裏提過一句：「王力雄獨身求解」。

這雙重的案例使我覺得有必要借這一機會來談論體制外生存。對中國人而言，對作家、學者、志士、思想家、商人、政客等等而言，這一生存狀態還沒有得到充分地注意。我們也很難描述這些人的生存狀態。我們見過的多是有頭有臉的人，招牌、身份、職業、榮譽，等等，令人肅然，令人見之即想攀援，搞點關係。即使那些據說代表良知正義，追求民主自由，要為歷史社會人民代言的進步力量，也有清流、改革派、自由派、大學教授，經濟專家等各種淨土樂園優裕生活驕人傲世。

這個在我看來是偽劣身份的中國現象的本質是甚麼，這些具有含金量，具有價值榮譽一類的生存方式以甚麼說辭標榜於世的？也許人們立刻想到了，貢獻一詞。的確，儘管文明社會裏個體對整體的貢獻在在皆有，在所難免；但具有家國傳統的中國文明在當代結出共產主義意

識形態的怪胎後，沒有比貢獻更能表明這個所謂的文明社會的立身之基了。馬克思曾以為商品能夠透視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貢獻一詞或者也能說明當代中國專制社會的眾多現象。個人為集體奉獻犧牲，個人的存在價值需要集體來說明，流毒所及，人都要為異己而活。當代文明社會時尚的是野外生存，數字化生存，媒體中生存，在中國社會裏，卻得注意體制化生存。專制的黨國體制是以解放人民挽救中國的名義出現的，人們必須堅持熱愛這些體制，必須活在以專政權力為中心的體制裏，大大小小的體制既團結在專政權力的周圍也是對它的複製和摹仿。在這種體制裏人們想當然地以為天下為公，以為中國是獨立、尊嚴而強大的；在中國生活，一切都是國家的、集體的、歷史的、民族的；在中國生活，人都是在為國家、集體服務，為民族和歷史作貢獻。那些也許是因「貢獻」而積聚起來的財富、權力和利益落實於部門，部門又落實於個人。主權為個人盜走，個人的生活權利卻以對主權的貢獻為前提借口。人們覺得自己貢獻多多，自己活著奉獻大於索取，從而心安理得地要求享受。在為個人私生活作辯護人時，他們總是以貢獻作為合法性。為黨國辛苦了一輩子，玩個把女人算甚麼，送孩子出國算甚麼。工人抗議政府，也多是以奉獻招引同情，辛辛辛辛幾十年，總不能一夜回到解放前吧。在這個社會裏，正當的生活水準和生活質量，無限豐富的人生經驗反而不敢輕易露面。炫耀富有、權力，進而貪污腐敗、人生賺了一把受人嫉羨，成了普遍的現象。而為體制拋棄並牢牢看管的農民階級則天生覺得自己是賤民，低人一等，他們因此除不得已是不會進城的，他們在交納自己的大部分所有後仍覺得自己貢獻太少，一旦天災人禍降臨，政府挑選到他們露臉，他們會感謝自己生有所靠，會說要讓自己的孩子長大了報效國家。這一現象魯迅先生在《理水》一篇小說裏有漫畫式的描述。

貢獻一詞的真實性如何？請原諒我沒能確定地指出其虛偽劣性和反義性。今天的我很難確定地用母語進行判斷，這一點我在後面會申說理由；同時，中國的當代專制社會在近30年來也發生較大的改變，要說明貢獻的影響恐怕需要《資本論》（*Kaptical*）那樣的深度和長度來論述。我今天所說只能粗淺得多地表達一下印象。

用甚麼來觀察我們社會無所不在的貢獻現象？這一經驗對我來說是非常早的了，我今天所說和做出的結論其實是幾年前就曾有過的。我觀察的角度是年齡。講貢獻的意識形態教育從孩子時代就開始了，一個正常的兒童，花季少年，人生的無限豐富和現時趣味被遮蓋，他獲教育的主要內容是：時刻準備著，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為祖國的崛起而貢獻，為燦爛的歷史文明自豪，為現時的成人世界例如申奧入世而展開笑臉，為課本上英雄人物的事跡和領袖人物的歪詩而生感恩敬愛之心。從教育學上考察，這一貢獻的要求如果不是成年人所應有的話，也不應是孩子所具有的。使命感、榮譽感，本來是某類精神有病的成年人慣於自我想象的東西，卻成為實在的重擔灌注進孩子的大腦。當孩子長大，在生理上完全成人了。政府社會及宣傳媒體在要求他甚麼呢？誠信而已，要勿踐踏草坪，紅燈停，綠燈行，要學會說你好，對不起，謝謝，本商場絕無假貨，不要騎車帶人，不要闖紅燈，省長怒斥文山會海受群眾愛戴，等等，花樣之多，也如兒戲。而13億之眾，日常教育就在於把做個好孩子的一點內容反覆放大提醒，僅僅要求成年人對社會即他們相互依存的環境做出一個孩子應該遵守的舉止言行規範。每年的榮譽，五個一工程獎，五一勞動獎，十大青年獎，等榮譽，不過是13億人裏的少數人可能做到了孩子應體現的品質。

我的結論是甚麼呢？13億人中真正的人太少了。這對於識破專制社會真相的人來說，這一結論也只是平常話。因此，假若對中國人而言，人世間真有所謂使命感和榮譽的話，我相信，「天地間最偉大的事業，莫過於做一個人」，這其實也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常識。

這個結論有甚麼意義呢？13億準孩子或類孩子心靈的成年人在一起，組成各種機構，體制，

學術的，教育的，出版的，行政的，一旦貢獻的面紗揭去，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不，不僅是這些庸俗的享樂主義大行其道，而且是瘋狂的佔有欲望主宰一切。當機構或說社會體制的力量過於強大，這些類人孩們就是擠入各類體制，按等級分類，按類別獲得資源。

實際上，各個文明都有自己的類人孩階段。人類的進化是相當緩慢而艱難的事，與類人猿揖別進化為人類，但頭腦和心靈仍有不少物性的、蒙昧的東西。不同地域裏的人類部族在生存發展裏創造了自己的文化，但其文化體制多半是對個體進行訓導、管制和奴役，個體還很少有自由和發展的機會。伊斯蘭文明，基督文明，中國文明，都是如此。在早期有神話，有自然的災害，有恐懼，等等，來威懾管制其個體。人們在一起組成社會共同體，有意無意地學會習得種種辦法來使共同體得以存在維繫。武力，獨裁，人格神，等等。所謂原始社會，所謂奴隸封建專制社會，等等，都是如此，人對他人構成了威脅，用存在主義的話，他人即地獄，因此，社會和人難以和諧發展，人也就難以成為健康正當的人，而多半是異化者，即類人孩。類人孩們大抵有兩種：一種是剝奪者，寄生者，他們不是自己勞動創造，如果他們設置建成了各類體制，資本的、權力的、符號的，自己就會在這些體制裏作威作福，如果不在體制裏，他們就是社會上的游民，破壞秩序，打家劫舍；還有一種就是社會上的順民，良民（仍不是良人），很多時候他們是前一種人的附庸和奴隸，被剝奪、凌辱、教化。馬克思看到農民階級不能代表自己，只能在被代表裏有希望獲得解放。其實，任何專制社會裏的順民都是如此，他們沒有自己的意見，只求活著而已，他們最多只能被利用。以至於到後來意識形態取代信仰來影響世界時，那些擁有先進技術手段的產業工人和白領市民也成為手段、工具和犧牲。在專制社會裏，政治不過是前一種類人孩們的遊戲，中國的詩人看透了這一點，所以會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類人孩對自己的本性也有極深的了解，他們因此不理解人有新生，有長大自立的可能，而對不屬於自己的人總是猜忌不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體制外的人因此難以壯大，體制外的類人孩常被稱為浪人、流民，據說是體制文化外的具有顛覆性的流氓文化，這兩種文化其實一樣。體制一有機會就會對這些「異端」進行招安、收編或打擊，而異端們多想「彼可取而代之」，一有機會就對體制的主流文化進行重建、複製，至於要做體制中人，「要做官，殺人放火等招安」。

當然，人類社會裏仍是有那種新生的可能，有那種看見「洞穴」外大光明的人，但他們要在專制社會裏生活，多半得離開體制，做一個隱士，或者逃離自己的故土，尋找新天新地。這是因為，雖然類人孩們建立的社會如沙上築塔，是脆弱的。各類專制的生活不是在發揮人的創造性，而是在相互傾軋，壓抑人的活力。但是，在專制體制的淫威發揮極致的時候，個人經常是無能為力的，中國文化裏把這種情境稱作「天葬」、「天譴」。那是善良的孩子也覺得無能為力並不忍看下去的時候，社會衝突極為緊張，政變、風潮、起義、造反、替天行道，等等，人性黑暗的大暴露分明表示人類世界不過一樣是叢林世界。面對人性的如此淪落，如軸心時代的人，那些有偉大同情心的孩子們，就會想破腦袋來救世。老子絕望得只能退隱西去，孔子也絕望得一度想「下海」（「乘槎泛於海」），墨子是非攻非命的，但他一生辛苦的情形為中國下層百姓熟知，也為聰明人覺得不值；至於其他文明傳統，佛子是倡言出世的，他對人性的墮胎也無能為力，對末法滅世時代閉口無言。他的思想後來深刻地影響到中國文明，為後者增添了忍的生存哲學。（實際上他是積極的，他是倡導和解的，他的思想的真正繼承者也許應該是聖雄甘地）。蘇子及弟子柏拉圖則在民主社會裏仍要論辯理想國如何存在。

如果說專制乃人性的一部分，是類人孩向成人過度時必須加以抑制的東西，那麼，獨立自由的情境也是人性所嚮往的，是人所願張揚的東西。以中國人數之眾，文明歷史之久，那些善

良的偉大的孩子們也摸索到了人性美好的邊緣。不僅希臘人流露了對人體美的熱愛，文藝復興借王子之口喊出了「人是萬物的靈長」，高爾基借流浪人之口說出「在俄羅斯做一個人多麼驕傲」，而且中國人也很早意識到「生生之為大德」。不僅基督教文明有千禧年之說，東正教有末世之說，佛教有法滅之說，宋代的歐陽修也曾把專制無序的社會稱為「天地閉，賢人隱」的時代，至於中國明清巨變之時，思想巨子們更觸到了後人所稱的專制層次之上，顧炎武們深刻地意識到，對文明社會而言，人必須活得像一個人，至於社會秩序，體制的敗亡倒在其次，因此，他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之事，肉食者謀之。天下之事，則匹夫有責。」

也正是對專制類人孩本性的洞察，各文明社會裏那些最聰明的孩子們對文明崩盤帶來的災害一直有著天才的直覺。各文明社會專制本性的爆發，對自己是災，對他人是禍。在這方面，中國文明社會同樣是一個典範，它的內亂不已，至於歷史學家們統計說它分裂的時間遠比統一的時間長，據說，中國歷史裏，平均18年要吃一次人肉。每一次王朝周期循環裏，政權建立之初的清明有序很快為腐敗侵蝕掉，迅速繁殖起來的人口和積累的財富之間失去了正當有效的配置，經濟流通不暢，社會關係緊張，階層分化嚴重，人們的得意失去底線，人們的憤怒難以節制，革命造反的衝動，毀滅的衝動，瘋狂佔有的衝動，造成了人對人的戰爭，這種人性黑暗的大暴露，須得延續相當的時間，等人們殺累了，才能停手，喘口氣，制定出從容一點的秩序。在人類文明早期，希臘的文明看起來是較為正常的兒童，他們理性地看待世界，相互依存，發明了民主的生活樣式，並給文明世界的演進樹立了典範。為解決文明傳統的問題，各文明社會的思想家們及其民眾相互作用，摸索出種種辦法。可以說，信仰是這些路徑的基石。以至於除地域命名各文明社會外，以信仰來命名是最為適宜的。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文明，等等，多是在現世現時之外尋找到了拯救之道。基督教文明在中世紀的黑暗之後，重新煥發出有著希臘文明底蘊的光芒；阿拉伯世界則在四分五裂之後信仰了真主；印度文明信仰起空無；中國文明則信仰天道人倫。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演進與個體的生長有著異質同構的關係。在各文明社會度過自己的孩童時代之後，信仰，對現世時外的敬畏不再起充分地作用，（凱恩斯說，從長遠看，人都是要死的），於是，西方世界最先突變，在信仰的基礎之上，他們有了對於現實社會的理性應對，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這樣的大事件最終影響了人類歷史，因為與其他文明社會裏的大事件不同，在這些事件裏，西方人有了人的覺醒，他們發現了人，用中國人的話，他們真正度過了自己的青春期，成人了；人們一再總結西方現代文明與其他文明社會的不同，政治架構，經濟制度，文化形態，以為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等等偉大光榮而正確的。其實，對文明社會的個體而言，他作為成人是一個獨立的世界才是重要的，他自己就是一個獨立的政府，傳統的國家機器和政權體制，在社會個體的成人世界裏不再佔據壓倒性的優勢；就是說，文明的進步並不在於一種社會裏是否有了民主自由一類的表象，而在於個人的世界是否足夠自立強大，是否國家體制外的社會空間能充滿著個人生存的機會和自由。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希臘羅馬時期，中國漢唐時期，人們的生活也是值得驕傲和後來者羨慕的。

近代以來，其他文明社會在西方文明全球化的趨勢下，不得不應對，調校自己。成功者並不多，其原因大概是，每一文明在對社會秩序的考慮裏，獨立發展出一套總體性的建制，這總體性的建制無論在別種文明眼裏是多麼易碎，在事實上也經歷多次毀敗，但文明社會在衰亂之後的興盛重建裏仍有自己的路徑依賴，這種路徑依賴並不以他人為準則；同時，每一文明社會的正當性都是不可比較的，無能說服的。因此，成功的文明轉型者多是拋棄本文明社會秩序的傳統正當性，而善於受惠摹仿他人者。如日本自古就受惠於其他文明傳統，近代日本社會更是不惜變種圖存，勢利得要脫亞入歐，它也曾夢想進行大和民族稱霸世界的偉業，但

這種類人孩的心態對西方社會的挑戰以慘敗結束，幸運的是，日本社會以一個整體加入了西方成人世界。在成人之前，善於學習的俄羅斯和和善於算計的德國都有不肯屈服的稟性，他們以文明精神的末流為自己的征服佔有衝動辯護，以黑格爾（Hegel）的絕對精神和馬克思主義學說，來挑戰文明世界，經過失敗和億萬生靈塗炭的代價，最終回歸進西方文明的主流。

文明社會的不可比較和無能說服的特徵，使得文明社會一旦衝突，爆發總體戰，表現形式是異常慘烈的。中國文明對歐洲一度釀成「黃禍」，伊斯蘭文明有過「聖戰」，基督教文明也有過「十字軍東征」，這些大大小小的文明衝突帶來的傷害是難以彌合的。直到今天，西方文明的全球化使得每一傳統文明社會不再自足，不得不對外交流和相互依存以求現代轉型，這客觀上的比較使得千千萬萬的類人孩覺醒成人，也使得千千萬萬的類人孩絕望，生存和發展無著。由此帶來的衝突也成為人們在政治正確性的警示下不願討論和深究的「文明的衝突」。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穆斯林人和基督徒，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中國人和美國人，其隔閡之深並不能僅以貧富主權人權文明野蠻一類即可說明。在成人世界以一個整體來對付類孩子社會時，成人世界的機心和霸道也具有了類孩子的特徵，這大概是部分國家對美國並不買賬的原因。因為人總是以自身為尺度解釋說明世界的。美國等西方社會看世界，自然以成人的眼光進行判斷，他因此宣稱中國朝鮮是流氓無賴國家，宣稱另外一些國家是可以打交道或不可接觸的國家，但一旦他記起來對方還像個孩子，他又會想當然把中國這樣的類人孩社會當作可以改變的好孩子，一再誘導或教訓，以為自己就可以改變對方；他忘記了整體性質的變遷取決於整體內部的變化，民族國家要進步，重要的在於它的人民多能獨立；另一方面，指望中產階級等成人的尺度一旦固化，如美國化，或如北京上海那樣體制化，仍是於事無補的。而從類人孩的角度看世界，美國等西方社會自然是自私的，只顧利益的，亡我之心不死的。這樣，本來需要轉型的社會更多的是固守著本土的文明傳統，仍以絕對的信仰要求民眾，從而使自己的社會日益破敗，民眾仍是待牧者，仍是待哺的孩子。如非洲，如伊斯蘭世界，如中國。

人們為甚麼要反專制，就是因為在人類發明的種種生活方式裏，只有把專制推翻，人才有望成為人。因為人是目的，人要告別童年，因為這是一個去魅的時代，要做一個人，要離開史前史的社會，進入屬人的世界。自西方啟蒙運動波及全球以來，確實有很多文明、國家、地區、種族，告別了專制政體或專制的生活方式，人們生活在具有現代性或完成現代化的社會裏，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現代性其實就人類所追求的獨立自由的人性。但對於中國文明及中國人，現代化遠未完成，無論我們今天的社會有甚麼樣的好名目，在中國，能活著的真正的人實在太少了。這個類人孩充斥的社會本質上仍是專制的。

這也是我們所說的今日中國問題的根本。因為中國文明是人類已知文明中專制歷史最為久長的，它從遠古綿亙至今，不曾中斷，即使是馬克思嘲笑非西方文明面對西方文明如木乃伊遇見空氣，一度如此慘痛的中國社會仍以時間和人力的規模維繫了專制的生活方式。實際上，假若說希臘文明是人類文明裏正常健康的兒童的話，中國文明實在是早熟的。對於人生的領悟，中國人其實有著更為利害的看法。他們實在地知道這個社會裏的慘苦，非理性，和類人孩特徵。傳說中的老子不願臨世，他生來已鬚眉皆白，所以人稱其為老子。我們開開語言學上的玩笑，可以說，中國人是在命名裏就道破了實在的秘密。他是看不起人的，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知道自己和他人都是類似孩子一樣無責任無信用的小混蛋，會用兒子孫子一類的貶抑語來跨人或作賤人，從而以示自己的優越。吾子也，或者說，非吾子也。用今天的話就是，好兒子，乖兒子，或者，真他媽孫子。中國的神話故事裏，也多的是「小的們」或「孩兒們」一類叫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孩子，是忠臣孝子，會做官的，是臣子，貪污腐敗

的，是亂臣賊子，看門的，是門子，做菜的，是廚子。而出生最好的孩子，當然是天子了。這樣稱呼來去，到後來，中國人明白了，社會上連具有正常孩子心靈的人都沒有多少，於是才有了語言學上的那種對男子的尊稱——子。但也只有少數人才可以孩子稱之。那些有思想的，也只是發育稍微正常有理性的孩子，如墨家鉅子，如思想巨子們，老子，孔子，孟子，等等，實在是少則又少的。因此數千年來中國真正有思想的孩子寥寥可數。

為使中國社會顯得文明，美麗，令人不要太過悲傷，把日子能過下去，中國人用了種種好的名目來彰顯美醜，這就是我們揭露的漢語的瞞騙功能，也是給西方人形成漢語世界是一片灰色印象的原因，漢語無能表達生命的熱烈和燦爛。是的，對中國人而言，這個保存了人類世界最大基因庫的群體裏，總有一些孩子是聰明的，中國人會說這是智者俊傑，總有一些孩子是善良的，中國人會說這就是賢人，總有一些孩子是美麗的，中國人會說這是紅顏。至於懦弱庸俗的，中國人會以鄉原不屑對待，混世魔王，則以奸佞梟雄表達無奈的順從。但漢語很少在事物的真實上下工夫。實際上，漢語的瞞騙功能在後來中國人慘苦的人生經驗中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中國人的情感世界就是簡單的黑白世界，在愛與恨的兩極搖擺。中國人的人生在後來就成為樂感文化裏的小小片段，成為活著哲學裏語言張揚，在宋元明清詩詞小令裏，我們能看到大量的這種人生悲歡離合的吉光片羽。也就是我在《惜語》裏曾說的，現實愈恐怖，吾人語言愈華美。在李後主之後，在亡國之恥莫恥於趙宋一朝之際，宋儒竟對中國人的悲劇視而不見，或者說熟視無睹，從佛教文明裏引進了一種消極的陰毒的自宮去勢的生存原則，存天理，滅人欲。中國人對生的感知模糊得不再真切。直到滿清入關，三百年來，由滿人為漢語世界貢獻了納蘭容若、曹雪芹、老舍等三個偉大的悲劇作家。國門打開，與西方世界相撞，更使尋常的中國人也認識到自己生活的悲慘。但是，專制的生活方式沒能改變多少，反而變本加厲。生活的苦難有時候竟讓人覺得前朝或歷史尚能給人安慰。因為同樣的瞞與騙，對類人孩的命名上過去要比現在簡捷得多。經濟學家、法學家、哲學家等等還是叫士子可能更好些，工人、農民等等還是叫黎民百姓可能更好些，明星、廚師、門衛等等還是叫戲子、廚子、門子可能更好些。

在中國文明社會裏，類人孩們在自私自利裏一度組成過相安無事各得其所的秩序。這是文明的燦爛時刻，如漢唐盛世，但更多，體制無能保護孩子，更遑論人。類人孩們終究沒有成為好孩子，更沒有演進成人，反而組成了一個個專制相賽的體制。毛澤東雖自比秦始皇加馬克思，可是我們知道，他內心裏參照的對象乃是晚近得多的朱元璋等人。（聽說英國人寫過一本小說，想象一群在與世隔絕的小島上的孩子們生存的命運，其情形正與中國文明演進相同）。

近現代以來的中國專制社會尤其充滿著罪苦與罰。它幾乎像印度那樣被西方殖民，但不幸地，它被稱為半殖民，中國人的殖民心態因此較之日本印度更甚，清末民初的偉大啟蒙因此難以觸及專制體制的根本，在露出共和民主的一點薄明亮色之後，它陷入了更深的黑暗。民國裏有竊國大盜，國民政府裏有領袖獨裁，共和國裏有馬克思加秦始皇，有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控制。的確，無論中國社會有了怎樣好的名目，人們的生活方式，人們生存的體制仍是專制的。或說，人們仍未能站起來做一個人，一個現代社會的公民。人們仍是像孩子一樣，沒有頭腦，沒有主見，沒有自己的世界觀。他們只能在專制獨裁下生活，只能在體制內才能活得踏實一點兒。最近50年來，尤其慘痛。毛澤東借共產主義來影響中國。他像神一樣主宰了中國。以至於他去世後，整個中國都陷入悲痛之中，因為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類人孩們失去了父親。

毛澤東死後是否好了一些？近30年來的改革開放恐怕對不同的中國人有不同的感受。我曾經

梳理過這其中的不同。毛時代像神一樣主宰中國，個體幾乎沒有貴賤地成為神的子民，階級鬥爭話語成為他那時代的主要話語，這當然是精英們所不喜歡，卻也是為民眾無知而少覺悟的奴隸時代；鄧小平以改革開放成為歷史人物，他以經濟建設主導中國，實質上不過是用孫中山所說的發財主義來引誘國人，這一觸及中國人的類人孩本性的辦法極為有效，精英們在這個社會裏如魚得水。民眾的生存機會日益逼仄，數千萬的工人下崗，數億的農民生活破產，地縣級財政淪為吃飯財政，省部委機關則是官員謀利的機關，民營經濟只能依附體制才能通吃社會，無論我們怎麼評說中國完成了工業化，完成了西化，拉美化，印度化，或資本主義化，我們的資本主義乃是受詛咒的一類。我們社會裏的一切仍同體制有關，一切仍顯得天下為公，都是國家的、政府的。當文明世界以媒體、非政府組織、社區自治、中小企業、私立大學、醫院、研究所、思想庫等種種形式來對抗權力，增加人自由活動的空間和機會時，我們的一切都只是體制化了。建築，道路，廣場，學校，醫院，報紙，電台，虛擬網絡，自然資源乃至人力資源，等等，都是體制的。人的行動在體制內，人的身藏也在體制內。人是按體制來定義自己，來說明自己活著的成就和意義的。社會空間小得可憐，體制自己監督自己，自己表揚自己，自己報道自己。

於是，儘管有異質文明的因素參照參與，哈韓哈日也好，媚美媚歐也好，只不過是給類孩子們的遊戲增加了奇巧淫技而已。王小波曾經唉聲嘆氣地說，在科技發達的二十一世紀，你給咱們鬧出一窩十幾億傻人，怎麼個過法嘛。他如果看到九一一戰爭或超限戰一類的說法，就知道，十幾億人並不笨，只是一窩沒有長大的類人孩。他們不舞槍弄棍則已，一旦舞起槍來，誰也不知道自己何時何地會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會被抄家，收監，會被坦克軋死，飛機撞死。正因為我們社會體制裏不存在真正的人，所以自古以來都有太上皇來威懾眾人，人到中年仍不能獨立地做事，只能虛無得萬事休也。而到了老年反而戀棧或跳將出來發揮餘熱，振興中華。（哦，彼何人哉？）中國人稱七、八十歲的老人為老小孩，即也明了他們從未有長大過，而他們又遠比孩子的心靈陰毒，他們對世間的留戀貪婪佔有甚至不能如其在壯盛歲月裏分辯出是非善惡，他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毀掉生命，用青春和熱血來滋養自己的尸居餘氣。中國人因此對專制生活裏不能成人而多老小孩的現象有深刻的自覺，痛陳「壽則多辱」，言外之意希望能保持晚節。鄧小平也是如此，他曾說，像他那樣的老人聊聊天還可以。何以他並沒有做到自己所說的，趙紫陽先生無奈自己老了卻仍得請鄧小平來掌舵，更悲慘的在於，當真正的孩子們上街要求成長的正常環境時，是由鄧小平這樣的老小孩決定了殘酷鎮壓。直到今天，我們的很多地方雖然有了民選形式，可是我們的人在體制面前總是要矮了一頭，我們的小區居民甚至在穿制服的門子面前也要說盡好話。體制化生存，使得中國人只能是類人孩，我們社會的中堅分子，那些成年人們要麼以淚洗面，哀嘆人生；要麼虛無做戲，毫無原則地追求人生簡單的擁有感；以至於從體制裏跑出來的民運分子們面對體制的強大壽命只能作「新亭之泣」，而更多流散到體制外的人如民營資本家和民間組織者們也借複製體制來建立自己的內部認同。人們無能了解並理解人生的燦爛，人們無能在體制外堅強自信地活著以抗擊體制的奴役管制和異化。

在目前的中國，在專制中國，要做一個人是困難的。用經濟學的話來說，成本極高，代價極高，高得個人難以承受。實際上，大部分中國人不知道做一個人是甚麼樣子的，中國人的生命意識是極為淡薄的，中國人不了解生命的秘密，（雖然他們總以為自己看透了造化的把戲，隨天地俯仰，與時世遷移，他們的人生是大賺特賺的），魯迅寫的一篇小文《我們怎樣做父親》因此成為名文。除了隱士外，大部分人選擇了生存哲學，活著哲學，選擇了類人孩們那種無法無天的勢利、奴性和殘忍，並且用最美好的說辭為類人孩們的行為和世界辯護。畫夢的詩人何其芳曾寫道，而今始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歡夢中道路的迷離。他後來卻也從

夢中醒來，成了中共文化體制的幫凶。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歲月裏，洞察了生命秘密的詩人穆旦寫過，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人的生活。

這就是我們要講述的王力雄先生生活的中國前提。但這個社會體制難以為外人道。外人看不出來，我們說不出來。外人看不明白，有日、俄、德等後發國家的先例，他們總是願意把中國當作可以變好的孩子，他們也用了種種辦法來逗這孩子，表揚這孩子，評這孩子為勞模，讓這孩子通過托福考試。我們說不明白。因為我們身在其中，我們四分五裂得沒有目標，共識。此人之藥，卻是類人孩之毒；這個人的人生價值與那個人的人生價值完全不同。像魯迅所揭露的，很多類人孩們甚至言行一致地以為，中國就是野蠻得好。

中國太大，中國是一個天下，除了食色本性尚依本能和傳統外，我們的吃穿住行，我們的交通、房屋建築、交流方式全部變了，我們的民眾也失去了鮮明的特徵。當我們為農民的苦難傷心時，小資正以半殖民的心態炫示中國人也在過好日子；當我們為民營經濟空間的擴大歡呼時，希望工程這樣的非政府組織也暴露出獨斷腐敗的特徵。甚麼是中國？當知識分子們批判文革時，另一些人會從農民的口述裏發現另一種文革記憶。甚麼又是中國人和中國的歷史？人們一方面可以宣告馬克思主義的破產，另一方面又以為經濟的發展可以自然而然地使中國進入到民主自由的社會；人們在吃人的體制和筵宴上佔據了好位置，卻對體制的不義和災難視而不見，以為歷史宜粗不宜細，等著吧，歷史會好起來的（對真正的人來說，現在就應該兌現一切）。不，不要以為這只是今天的中國。這是中國體制裏的老例，內辱外侮都是如此。日本佔領時期，北平的警察在維持秩序，河南的農民在為日本人站崗放哨，山東地面的百姓在娶妻生子，過日子。而今天的中國，當大部分人無助於自己的生存安全需要時，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中的俊傑們早已體驗到現代化的最前沿的物質果實。在中國的倫理信仰為現代殖民心態取代後，在歷史主義和現代化的多重困境裏，中國社會的好與壞，其未來的發展前景格外引人注目。但有多少人能在中國真實而正當地生活？

出身很好，也曾西裝革履的甘地先生，他也是印度社會體制外的人，但他後來終生穿起了印度農民的素裝，他曾系著腰布前往白金漢宮見英國國王，英王問他，甘地先生，印度好嗎？他指著自己瘦削的肢體和破舊的腰布回答，看看我，從我身上你可以看出印度的現狀。但是，天，我們能有甘地先生那樣的智慧，表達我們自己的現狀嗎？我們真的是中國那無能無告而沉默苟活著的大多數的「貼心人」嗎？

那麼，誰能代歷史說話？誰能代言人民，主權，國家，人權，產權，真理？誰能預言中國？誰敢說體制乃存在即合理，誰又在努力地改造更新我們的生活方式？誰才應是我們感恩的對象？我們表達的根據在哪裏，我們經驗的材料又如何產生？我確實無能確定地進行判斷。

具體到王力雄先生。他從沒有以知識分子自居，他沒有以為自己在代言良知正義。但對於自己要甚麼，一生要做甚麼，他卻考慮得極為清楚。他是把中國問題當作自己思考的對象，當作自己實踐的對象。為此，他很早地時候就離開了體制，沒有正式工作，至今未娶。描述體制幾乎人人都會。但要說清楚像王力雄先生那樣體制外人的生存卻並不容易。我也是只在近年來才放棄一切社會身份的。生活的諸多不便，首先面臨的問題，何以謀生？然後，郵局、銀行、住宿、出國、結婚、訪友，誰來證明，你有工作證嗎，你有介紹信嗎，你是哪個單位的？更重要的，如何解答跟生活的緊張關係，今年春節，王力雄先生辦完《遞進民主》網站的開張工作的時候，身上只剩下幾百塊錢了；他又如何糾纏應對跟專制社會的緊張關係，他如何在丁爺和安小姐的關懷下正常地生活，直到今天，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仍不能在中國大陸公開出版發行，春節後丁爺的宣傳機構甚至打招呼不準大陸媒體上出現王力雄的名字。還

有，他如何解決跟同仁們建立聯繫，難道僅僅義氣相投嗎，即使是志士仁人也得在中國以類人孩或是成人的方式解答生存的全部內容，那麼他又又是如何幫忙，如何建議的？最後，他如何注重自己的裝束，在中國這樣素以衣貌取人的社會裏生活，他像甚麼呢？

一個生活在北京的幹部子弟，體制內的精英，在青年時期何以要走這條路，（那還是中國人的人生軌跡被牢牢鎖定的時代），正如他後來的文集《自由人心路》所透露的信息，我們可以理解為那是要做一個自由人，其道路是其代價，也是其選擇。做一個人所能做的，這個人就不是類人孩們所想的那種生存權為人權的吃飯哲學，不是專制生活裏的車子、房子、票子、妻子，不是主流價值規定的行為方式，不是體制定義的活動範圍。王力雄選擇的探索是中國人如何改變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因為在體制所確定的關係裏，中國人仍無能進化成成人，類人孩的惡欲仍會大暴露。他因此寫了《黃禍》這本小說。以六四後的中國發展為背景，說明中國文明社會如果不能尋求到自己的成人之道的話，那麼就像毛時代的人民民主一樣，仍會有一個假民主的階段，這個假民主的社會借助於電視，現代通信等高技術手段更為殘忍，對主權、國家、人民等概念的爭奪更為戲劇，最終，類人孩們玩火，權欲、私欲、貪欲等支配主宰中國，激起了中國社會的內亂，中國人首先對自己的同胞使用了核武器，然後拖美國、俄羅斯等核大國下水，首先是中國自己，然後是世界進入核冬天。人類文明史上關於中國文明侵略性的黃禍的恐懼在這裏是以這種自殘形式出現，令人觸目驚心。因為除伊斯蘭文明世界外，世界其他文明社會裏，中國是唯一形式上都沒有採納民主制度的文明大國。中國文明如何向民主社會演進，或者說，除了逃離本土移居其他文明，以認他鄉作故鄉外，中國人如何告別自己的史前史社會，中國人如何成為人，可能是真正值得關注的中國問題。因此，儘管王力雄的眼裏多是歷史的脈絡，人物的表現反而漫畫化。這本小說仍是極為重要的。六四後不到兩年即在香港出版的這本小說，也很快為世人周知，被評為二十世紀中國一百部最佳小說之一，至今印刷十五、六次。

《黃禍》雖不是一本優秀的小說，《天葬》卻是一本出色的論著。為寫這本論著，王力雄先生去西藏生活、考察十多次。中國文明乃是向心系統的等級專制，其對周邊的控制多大而化之，因此，中國文明社會裏，天下大勢，在內部的分分合合，在周邊的散散聚聚幾乎成了一種社會動力機制，離散是為了聚集，分裂是為了統合，失去的將會再有，埋怨的將會言和。但當西方文明突變，向世界擴張之後，民族國家的概念誕生了，主權的觀念形成了。中國文明的重心或主流不再對周邊構成唯一有吸引力的東西，在西方文明的民主自由面前，中國文明反而日益失去了凝聚力，周邊民族開始以西方的主權觀念要求自己存在的獨立身份。因而，一方面是中國自身需要現代化，一方面是中國文明體系中的諸多單元要求享有西方文明主宰的國際體系裏的主權國家身份。新疆、西藏、蒙古、台灣等等，就成為中外爭論的焦點和難題。王力雄以「天葬」這西藏的文化傳統象徵作為書名，也是暗示當代中國的邊疆治理以及中國與世界其他民族國家共處需要幾達天人極限的智慧。任何站在個人、歷史、民族主體、國家、主權等角度上的辯難都於事實的解答無補。有時候，人類關係的爭勝確實不是道理所能規定的，人類的關係也不是只存在一方的道理，它是信念的寬容，也是利益的磨合。王力雄盡可能忠實地羅列出中國北京政府、西藏達賴流亡政府以及西方各自的理據，說明各方誰也不應該抱有吃掉誰的優越姿態。

正是有這些創作和論著為基礎，王力雄還推出了他的政治哲學。即在中國這樣專制深重的社會裏，人們必須學會的民主實踐是跟周圍人的關係。遞進民主的概念因此被提了出來。儘管這在西方民主知識譜系的參照裏，簡直如野狐參禪，但王力雄頑強地把西方鐵板一塊的民主概念拆分成了具有本土意義的內容。

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很早注意到了王力雄的工作，學術委員會認為他以個人的努力實踐了中國人的自由。無論體制內外，像王力雄先生所達到的個人境界都是少有的。他致力於思考中國問題，並從文明的集體意識裏如黃禍、天葬等中吸取靈感，賦予這些傳統的語言符號以新的精神要素，他獲得當代漢語貢獻獎當之無愧。稱量他的寫作裏的知識含量或所謂思想含量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站在體制外，反思體制，並試圖有所改變。中國問題，在世俗化和體制化的聰明人看來不存在，或大而無當的沉重，已使人們很少注意，但王力雄沒有回避這一切。他也是迄今為止不多的以這樣嚴肅問題的寫作影響到中國社會大眾的作家。如果我們想到他早年就寫有一部名為《永動機患者》的小說，我們也許可以不帶機鋒地描述王力雄，他是我們時代的永動機患者，他忠於自己的理想，他完全是由他自己規定並來創造的人。他並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要幫共產黨忙的人，也不是那種自我膨脹要救天下萬世的人，他關懷的遠大卻立足於實在而具體的實踐。聽說他也曾幹過開音像店賣盜版錄像帶一類的活動，這種中國社會空間裏的權宜在盜版有理者的眼裏也是勇敢之舉，其實是中國社會空間在體制的擠壓下的無奈抗爭。直到今天，他還是中國大陸的環境保護一類組織的倡導者和躬行者，他自己也花錢救援了兩名邊遠地區的大學生，每月抽時間見面，關心年輕的大學生們的學習。他不是自由主義的信徒，但他卻在中國的土地上實踐了一個人的自由。

儘管他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的學術委員們也並不全都把選票投給了他，也確實有如茉莉女士指出的那樣，他有一些明顯的缺陷。他在寫作裏力圖客觀其實主見在在皆是。他並不顯得絕對正確，完美圓滿。但是，這就是人哪。因為人活著並不是為了一個正確的觀念，不是為了受一個偉光正的觀念支配，也不是要做一個好孩子，黨的好兒女或祖國母親的孩子。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國人的生存史上，多少真理被冊封後奴役了人，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市場經濟、後現代主義、全球化、自由主義，等等，事後都證明了問題多多，殘毒中國之烈已不能以神魔參半功過相抵來評價。如果人不能繼承自己文明裏的偉大傳統，不能發大願心舉大意創造自己，展開自己，成就出明道淑世和特立獨行的人格，成就出威武不屈富貴不移的人生境界，那麼個體的作為不過是專制體制裏的類人孩們的爭勝而已，是唯彼作威作福的貪婪化身而已，是穩定的制度機器裏專制的生活模式裏苟且幸福沒事偷著樂的虛無者。他的存在就是以污染惡化環境並傷害他人為前提的。他所有的口吐真言，他所謂的良知良能和深刻得絕望的理論就只是一種姿態、標籤。

因此，儘管體制內的人也有自由的靈魂，民主的訴求，可能是基督的忠實的信徒，佛法的背誦者，儒學的通人，但是體制內履踐自由者的成效並不多見，基督儒者佛子在我們社會裏也不曾有過。實在地，在中國社會體制日益成為這個社會衝突和矛盾根源的今天，體制外人更有可能取得做人的成就，真正做到自度度人，自覺覺他。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迄今為止獎勵的先生們，多是體制外人，也並非巧合。北島先生至今流亡海外，不得歸國；李慎之先生雖是體制中人，但他為自由主義的破題卻在退休之後；王康先生則蟄居重慶；周星馳先生最好的作品也是借助香港的環境得以創造出來。現在，第二屆當代漢語貢獻獎又瞄準了王力雄先生。的確，以十年、二十年為期乃至以整個生命本身為期，體制外的人更有自由的心態，更有成就自己從而參與文明社會良性演進的可能。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們社會裏的體制力量不僅沒有減弱到很容易被監督改造的地步，而是在日益加強自我導演，民間力量，社會空間，多元多樣的生活方式，個人的生存和發展路徑不僅沒有擴大而是在日益縮小。體制力量的強大已使得體制中人不再對現實說話，改革初的幻覺完全破滅了。那些認為體制可以變好的聰明人，那些辯護說在體制內是為了打入內部而推翻之的人，如今多已沉默。因為改革已經結束，中國的轉型已經結束。毛時代之後改革20年來的眾神喧嘩，在今天看來不過是「上帝無言百鬼猙獰」的過程，新生的人，新的信仰，新的民族精神和立國原則，沒有出現。出

現的是上帝死後的世俗化，是類人孩們爭奪資源位置之後的小鬼當家和眾神歸位，是小資和憤青等具有殖民心態的孩子們，是新人類和新新類人的類孩子們粉墨登場。一切與人無關，一切與民眾無關。

沒有社會身份並不表明一個人有甚麼值得驕傲的資本。值得我們討論的是有身份的人和沒有身份的人在履踐自由方面不同的進路，誤區和效果。我們知道，上個世紀末至今中國大陸重要的社會思潮之一即是自由主義的傳播及其反動。可是自由主義的信徒們多是體制中人，他們在體制內的作為多是以為自由主義可以救中國，若問他們有何具體的途徑，他們多半會歸咎於體制裏的語境不容討論而語焉不詳。從事實上，他們不會躬行自由人的活動。他們呼喚出的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也只是專制體制的一個裝飾。他們以為這個體制是可以改變的，他們是補天派或說打入保壘內部的奸細一族，四五一代，八九一代紛紛擠入學術體制，教育體制，新聞出版體制，衛生醫療體制，他們是分得資源的聰明孩子，幫助體制維和、繁榮而已。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們，如魯迅，胡適，在中國生活必須時刻對體制保持警惕，像魯迅那樣不惜決裂到成為徹底的個人主義者，成為體制外人；像胡適那樣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存在主義者薩特〔Sade〕也曾洞明這一點，他明確表示拒絕來自官方的榮譽）。然而，到今天，環視中國，能稱得上人的有多少呢？人們多是顯示他們是有權的，有錢的，有知識的，就是少有張揚他們是一個人（如前所述，類人孩們的這些把戲是無能說服，不可比較的；類人孩們的權力、財富和知識在真正的人眼裏只是一種陳腐的材料而已，以知識領域為例，我們能想見一個中國的類人孩可以精通西人文學、哲學，但他卻無能創作出西人親切的文學和哲學作品。一方面，我們鄉原的知識體制難以與西人的知識體制接軌；另一方面，我們真正的漢語知識缺乏張揚和傳承，因為真正漢語世界裏的重大命題是需要自我規定自我解答的）。像北京大學在現代史上出過那麼多富有性格的教授，今天卻只是體制裏令人放心的一部分。因此，專制中國的瓦解需要更多自由人的出現，像馬克思所說的成為自由人的自由聯合體。因此，既不要做超人，也不要做奴隸，既不要做大師，也不要做螺絲釘，而是要做一個人。做一個人，不要說自己是自由主義者，是哈耶克（F. A. Hayek）、哈威爾的信徒，不要說自己只願有信仰，有愛，有民主，有自由；只要你是一個人，憎恨也是你的權利，對專制的不寬容也是你的責任。固然，人可以隱居，可以逃離以保自己的清白，但仍有一類人，作為共同體的一分子，懷著慈悲不忍甚至智力的趣味，擔當，同事。而要有大的作為，就需要體制內外的仁人志士共同努力，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增進我們社會生活的福祉。

有一類聰明的孩子為體制辯護，以為這個體制之如此的根源在於中國的資源硬約束；他們從未沒有想過，中國的罪與苦，中國人之不能成為現代文明世界裏的一員，其根源在於這種體制的約束。更多的聰明人，意識到這個體制和中共政權是要滅亡的，他們一方面嘲笑著這個政權和體制，一方面以為只有自己才是配享有和正確運用體制資源的人，一方面聰明地以為自己可以超拔出中國社會而與歷史和國際社會接軌，他們是歷史人物，是國際大師和大亨。出一趟國就以為是個人了，就像吃了幾天飽飯的老百姓以為自己是個人了一樣。他們出入中西社會，對中國的專制生活不曾自覺，他們甚至認為自己是活得不錯的人，他們更容易看到他人身上的惡來，人們一再嘲笑窮人、弱者、農民、工人，甚至歐西美國，理由就在於後者自私、壞、貪婪、不文明、愚昧可笑，自己應該佔有一切，受其供養，甚至是他們在供養後者，沒有他們領導軍隊警察，社會就沒有秩序，沒有他們開工廠，工人就養不活自己，沒有他們討論學問，年輕人就沒有學養，沒有他們指導逼迫，農民不會想辦法生產致富，沒有他們的實物生產，美國就要喝西北風。天下都是他們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們也知道革命到來，穩定被破壞，將會是暴民暴行的世界，「普天之下，莫

非暴民；率土之濱，莫非暴行」。但是，類人孩們很少有反省之心，很少有反思的生活態度。他們從不意識到自己可能是非人的。他們不會像顧準那樣反思體制，你們身上都有血？這個社會對體制外的邊緣弱勢人群既無自由和機會，也無保護的責任。對體制內的各類人則是典型的生存主義，過好日子主義。體制內的朋友可能以為他們維繫了社會，但正如中國民眾們批評的那樣，他們不維繫也許更好，他們更大程度上是維繫了體制，維繫了專制的生活。

談論中共政權必然滅亡命運的文字已非常多，聰明的中國人實際上早就在人人想拳經地準備後路了，他們用各種辦法侵蝕質疑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用各種辦法掠奪中共看管的民族社會裏的全部資源財富（他們對外叫囂的主權又落於何處呢？而一個真想在主權問題上較真的國民又如何確定並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力和財產權力？人人以「貢獻」二字遮羞自己，他們一生貢獻給了誰，歷史、人民、體制、國家？誰又能證明？事實上，難道真如長安街上看到為申奧成功而歡呼的老百姓，而大加嘲笑的官員們所說，這是咱哥們兒的榮譽，跟他們有甚麼關係？）。我為中共悲哀，我因此毫無顧惜地希望它的早日滅亡。

儘管官方的宣傳機器及二醜幫閑們一再論證其盛世昇平，但即使官方搶奪三個代表一類偉光正的說辭也掩飾不了其政權的非義性，幫閑們關於制度創新乃至和平漸進過度一類的鄉原理論也掩飾不了現實社會深刻得難以調和的斷裂。問題不僅在於此，還在於，政權倒台後，一個良性的社會如何建立，是否體制的老調子又會唱下去，清算、寬恕、和解的新生社會體制及生活方式如何可能。在這些方面，我們幾乎是一個空白。因為中國人多是一個體制中人，多是專制生活模子雕刻出來的類人孩，他從未習得學會群己權界，他不曾照顧好自己，他是要徵用外界即使淪落也要拖人下水的。中國人多是抱著孩子的心理，沒有責任感沒有社會意識地混日子，得過且過，這種僥倖苟且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的治亂循環，造成了當代近乎印度拉美那樣鎖定的中國社會狀態。對很多中國人而言，他是在黨的人，是在合群中自大的人，是在體制裏的人。很多人一日無君父則惶惶如也，離開體制了即終日如喪家之犬，削尖腦袋也要求做體制的奴隸。用他們的經典語言，他們這輩子最大的本事就是做體制中人，做共產黨的官。即使體制外人，想有所改變甚麼，也因為種種條件而極為困難。如王力雄先生，他在提出問題，揭示文明破壞力量方面是出色的，但對文明建設方面的構想若不能說是可笑的，至少也是一個神話。

我從未想過推翻某個政權，可是無數次裏，我在心裏發誓，要為改變我們文明社會的體制而工作，要在有生之年能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生命的美好，要讓醜惡的現象，類人孩們的活動受到應受的限制。可是，對我個人而言，我所有的只是手中之筆，我所做的，只能希望時間的流逝能使我心安。我完成的只是我自己。

今天，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和我本人所做的也只是這樣一件工作，我們表彰王力雄先生，向他致意並無特別的意義。我們也說服不了政客、鄉原和正人君子們，他們有他們的標準和關於中國獨特的說明。在中國，說出皇帝新衣的事件不止一次兩次了，如胡風、顧準等人，但中國的孩子們沒有西方童話裏那個孩子的好運，那裏面畢竟有那麼多成年人，人們都來應和孩子的純真，皇帝的新衣展覽就再也無能進行下去；中國不然（顧準至今為中國的聰明人批評為沒甚麼思想），這只能說明中國社會裏沒有甚麼人，多的是類人孩，是善於起哄或合群自大的類人孩。聰明的類人孩們都有自己的眼光。例如，也許在能詩的江澤民先生看來，當代漢語貢獻獎不一定是需要授予王力雄的，為當代漢語世界注入「活力」且新詞不斷如「三個代表」、「假日經濟」、「申奧」、「入世」的主人才可能是合適的得主；中國的創造了無數的企業文化的企業家們可能也有自己的人選；語言學家們更可能會給我們的工作吐滿口

水。但這並不要緊。這是我們的人生過程。

因此，在向王力雄先生表示賀忱之時，我得感謝王力雄先生，他使我有機會清理一次內心世界。

最後，說一句也許無聊的話：希望本獎有助於中國大陸民眾更多地了解王力雄及其作品。

余世存 男，1969年2月生於湖北隨州。199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先後作過中學教師，浪子，北京混混，現在社會上打工過活；曾在一些新聞出版部門工作過，一度出任中國土地雜誌副主編，科學時報助理總編輯，戰略與管理雜誌執行主編。發表了詩，文，論若干，出版有《黃昏的繽紛》《重建生活》等文集。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期 2002年6月29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